

朱光潜(孟实)先生84岁时曾说过:“我一直是在写通俗文章和读者道家常谈心来。”读过这位名教授数百万言著作和译著的人,无不感到他的文章,即便是阐述艰深费解的美学问题和哲学问题,也都是以极其晓畅通俗的笔调在和读者谈心。接触过他的人也同样感到,在生活中,他喜爱和朋友、学生随意交谈。亲切随和的谈心,汨汨地流出了他露珠似的深邃的思想和为人文(红楼)的品格。可惜的是,这些闲谈,其中许多并未形诸文字。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在燕园生活了五年,还没有机会与先生说过一句话,更别说交谈、谈心了。50年代中期,北大一度学术空气活跃,记得当时全校开过两门热闹一时的播音课,一门是《红楼梦》,由吴组缜先生和何其芳先生分别讲授;另一门是美学,由朱光潜先生和蔡仪先生分别讲授。那年我上大,年轻好学,这些名教授的课,对我极有吸引力,堂堂不落。课余时间急忙从这个教室转到那个教室,连上厕所也来不及。朱先生的美学课安排在大礼堂,从教室楼跑去,也要10分钟。常常是当我气喘吁吁地坐定,朱先生已开始了讲。他是一位清瘦的弱老头,操着一口安徽桐城口音,说话缓慢,瞪着一双大眼,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学大师。朱先生最初留给我的是这使人容易接近又略带某种神秘感的印象。当时美学界正在热烈争论美是什么,是主观,客观?……朱先生是论争的重要一方。他的观点有人不同意,甚至遭到批评。讲授同一课题的老师在讲课时,就时不时点名批评他。朱先生讲课态度从容,好像激烈的课堂内外的争论与他很远。他谈笑风生,只管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中国引经据典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讲得条理清晰,知识性强,每次听课的除本校的,还有外校和研究单位的人员,不下五六百人。下课以后,人群渐渐流散,只见他提着一个草包,里面总有那个小水瓶和水杯,精神抖擞地沿着未名湖边的水泥小径走去。几次我在路上等他,想向他请教听课时积存的一些疑问,可当时缺乏这种胆量。

60年代初,他从西方语言文学系到哲学系,特为美学教研室和文艺理论教研室的教师和研究生的讲授西方美学史。我们及时拿到了讲义,后来这些讲义成为高校教材正式出版了。也许因为听课的人只有一二十位,房间也变小了,或许也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年龄增长了,在朱先生的眼中我们算是大学生了,他讲课时常停下来,用眼神向我们发问。逼得我在每次听课前必须认真预习,听课时全神贯注,以防他的突然提问。后来渐渐熟了,他主动约我们去他家辅导,要我们将问题先写好,头两天送去,一般是下午3时约我们去他的寓所。那时他住在燕东园,怕迟到,我们总是提前去,有时走到未名湖发现才两点,只好放慢脚步观赏一番湖光塔影,消磨时间,一会儿又匆匆地赶去。星散在花园里的一座座小洋楼静谧得连一点声音也没有。我们悄悄上了二楼,只见朱先生已在伏案工作。桌面上摊开了大大小小的西文书,桌旁小书架上堆放了积木似的外文辞典。他听见我们的脚步声近了才放下笔,抬起头来看我们。他辅导的语调仍然是随和的,但我并没有太感到他的亲切,只顾低着头,迅速一字一句地记。我们提多少问题,他

答多少,有的答得详细,有的巧妙地绕开。他事先没有写成文字,连一页简单的提纲都没有。他说得有有条不紊,记下来就是一段段干净的文字。每次走回校园,晚饭都快收摊了,一碗白菜汤,两个馒头,内心也感到充实。晚上就着微弱昏暗的灯光再细读朱先生的谈话记录。他谈的问题,往往两三句,只点题,思索的柴扉就顿开了。

我曾以为永远听不到朱先生的讲课了,听不到他的谈话了。十年内乱期间不断听到有关他受难的消息。其实,这二三十年他就是在长久的逆境中熬过来的,遭难对他来说是正常的待遇,他的许多译著,如黑格尔《美学》三卷四册,这一国内其他学者难以替代的贡献,就是在他多次挨整、心绪不佳的情况下凭借顽强的意志完成的。

1980年,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讲稿,使我和朱先生有了较多的

转回来,定了定神,高兴地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夕阳将周围涂上了一片金黄。在路上,他仔细问我的生活起居,当听说我晚上常失眠,吃安眠药,他批评说,文人的生活一定要有规律,早睡早起,千万别养成开夜车的习惯。下半夜写作很伤神!他说写作重要是能做到每天坚持,哪怕一天写一千字,几百字,一年下来几十万,就很可观了,一辈子至少留下几百万字,也就对得起历史了。他谈起北大好几位教授不注意身体,五十一过就写不了东西,开了不课。这很可惜。他说,写作最怕灯光再细读朱先生的谈话记录。他谈的问题,往往两三句,只点题,思索的柴扉就顿开了。

我谛听朱先生的多次谈话,强烈地感到他的真知灼见是在极其坦率的形式下流露出来的。他把刚写的一份《自传》的原稿给我看。我

近40万字的巨著。起先每天译一两千字,后因病情不断,每天只能译几百字,前后共3年。他考虑这部书涉及的知识既广又深,怕一般读者阅读困难,决定编写一份注释,待再版时附在书末。家人和朋友都劝他,这件事先放一放,或者委托给年轻得力的助手去做,他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休息,精力好了,抓紧写些最需要他写的文章。他考虑过这个意见,最后还是坚持亲自编写。他说,换人接手,困难更多,不如累我一个人。有次在病中,他说希望尽快从《新科学》中解脱出来。他想去家乡有条件疗养或一种清静,有人开笔露出了才华,后来懒了,笔头疏了,眼高手低,越来越写不出。脑子这东西越用越活,笔头也是越写越灵。

我谛听朱先生的多次谈话,强烈地感到他的真知灼见是在极其坦率的形式下流露出来的。他把刚写的一份《自传》的原稿给我看。我

一边看,他顺手点起了烟斗。他备了好几个烟斗,楼上书房,楼下客厅里随处放着,他想抽烟就能顺手摸到。朱先生平日生活自理能力极强,而多备烟斗这个细节,却反映了他洒脱马虎之处。他想抽烟,就能摸到烟斗,比他人随身带烟斗,或上下楼去取烟斗要节省时间。

他说:“这篇如你觉得可以就收进《艺文杂谈》里,让读者了解我。”我觉得原稿中有些自我批评的谦辞过,便建议有几处要加以删改。他想了会儿,勉强同意,“不过,”他说,“我这人一生值得批判的地方太多,学术上的观点也常引起争论和批评,有些批评确实给了我帮助。一个人的缺点是客观存在,自己不说,生前别人客气,死后还是要被人说的。自传就要如实地写。”时下像朱先生这样恳切地暴露自己弱点的实在鲜见,难怪冰心听到他逝世消息时脱口说出他是位真正的学者。最近我编《十年(1976—1986)散文选》,特意选了《自传》,愿意更多的朋友看到他瘦小身躯里鼓荡着的宽阔的胸怀。

在我的记忆里,朱先生的闲谈从来是温和的,缓慢的,有停顿的。但有一次,说到争鸣的态度时,他平静地说到批评需要有平等的态度,不是人为的语气上的所谓平等,重要的是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在需要争论的地方开展正常的讨论。说着说着,他突然有些激动地谈起一篇文章被争鸣的例子,过去许多本来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问题、理论问题用某种方式批评,结果变成了政治问题。朱先生希望中青年理论家要敏锐地发现问题,敢于形成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那些年,每次看望朱先生,他都要谈起翻译维柯《新科学》的事。这是他晚年从事的一项浩繁的工程。他似乎认定,这部书非译不可,非由他来译不可。他毫无怨言地付出了晚年本来就不旺盛的精力。他是扑在《新科学》的封面上辞世的。他在83岁高龄时,动手翻译这部

2月19日,总参原兵种部政委田永清将军给我打电话,说晚上请我与二月河一起吃饭。

二月河,何许人也?连续创作了《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13卷530多万字的“落霞三部曲”长篇历史小说,风靡大陆、港台及东南亚,在美国被评为“海外最受欢迎的中国作家”;中共十五、十六、十七大代表;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听说与二月河这样闻名遐迩的大作家会面,既有些紧张,也有些兴奋,还有些不屑。紧张的是,二月河名气太大,连我一个对文学懵懵懂懂的小字辈,在人家面前不自在,一旦说错了什么,让人笑话。兴奋的是,能与蜚声海内外的“皇帝作家”相识,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幸福。不屑的是,早听说名人一般都比较“牛”,与名人打交道,常常要忍受一些坏脾气,他会高傲,会狂狷,会怠慢,晦气得你想扭头就走永远不想再见到他。

路上,田将军把他与二月河相识相交到相知,从二月河的性格秉性,从他利用军旅生涯刻苦读书到转业后走上作家之路,向我娓娓道来。

二月河原名凌解放,1945年农历九月出生于山西省晋阳县。当时人们正沉浸在抗战胜利和上党战役捷报、家乡获得解放的欢乐中。身为县武装主任的父亲凌尔文和战友们一起给这个婴儿起名叫“凌解放”。“凌解放”和“临解放”谐音,带有盼望和迎接解放的意思。“二月河”是他40岁出版《康熙大帝》第一卷时,首次用的笔名。他认为,自己创作的是长篇历史小说,而在楼前散步,躲避地震时临时搭起的那间小木屋还没有拆除,他看看花草,又看看这间小屋,突然问我:最近忙不忙?我一时摸不清他的意思,没有回答。他说如果你有时间,我们合作搞一个长篇对话。你提一百个问题,我有空就回答,对着录音机讲,你整理出来我抽空再修改。我说安排一下可以,但不知问题如何提?他说,可以从他过去的文章里发掘出一批题目,再考虑一些有关美学、文艺欣赏、诗歌、文体等方面的问题。每个问题所谈可长可短,平均两千字一篇。他当场谈起上海同济大学从周教授写的有关园林艺术的专著,很有价值。他说,从园林艺术研究美学是一个角度。外国有两部美学辞典,关于“美”的条目就列举了中国圆明园艺术的例子。他答应空些时翻译出来给我看。那天,我还问起朱先生为什么写文艺评论,为什么随便就喜欢用两个词和书信体。他说你这就不提了两个问题,你再提98个题目便成了。他又说,你还问过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对后来的文艺发展究竟哪个的影响大?这又是一个题目。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红楼梦》是散文名篇,有人认为“散文名篇”应改为“著名小说”,他不同意。为什么?这里涉及中国古代散文的概念问题。他笑着说:题目不少,你好好清理一下,联系实际,想些新鲜话没有趣的题目。我们约好冬天开始,我一周一去。后来由于他翻译维柯《新科学》没有间歇,我又忙于本职工作,一再一趟城也不容易,就这样,一拖再拖终于告吹。朱师母说,朱先生生前有两个未了的心愿,一是未见到《新科学》出书,一是未能践行春天去看望老友叶圣陶、沈从文。我想,这个闲谈记录未能实现,也该是朱先生又一桩未了的心愿吧!

大都是军人,我就讲讲。”说起当兵的历史,这位年逾花甲的大作家,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幸福。

“我1968年23岁参军,1978年10月转业,十年半的光阴。我当的是被称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工程兵。在部队我开过山、放过炮、打过眼、挖过煤,什么苦活累活活活都干过。”这时有个小故事:有一次,在打坑道时,由于点火引爆,他险些被窒息在坑道里,若不是他急中生智,把军用胶鞋顶在头顶,顺着巷道狂奔快跑,恐怕今天的文坛上就因少了二月河而寂寞许多。还有一次,在推运装石料的翻斗车时,由于极度疲劳,他从两层楼高的河堤狠狠地摔到了河滩上。“部队生活锻炼了我的意志和体魄,练就了执著地干好一件事情的功夫。这几年媒体采访我,我都

二月河的军旅人生

刘逢安

“如果没当过兵,但知道他当过10年兵的人就不多了。”田将军说,“参军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10年的军旅生涯,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是他人生中极其重要的阶段。”我很想了解军旅生活的磨砺与二月河怎样写出厚重的文学巨著有着怎样的联系?可又担心名人“牛气”,不好打交道,田将军看出了我的顾虑说,二月河确实比较“牛”,但他是看对象的,他也确实有脾气,但也是分人的。河南女作家王钢在给二月河的一部书写序时,曾这样评价二月河:“这个军旅烽火中诞生的孩子,思想摇篮是先天的粗糙和沉重,人生乳汁是先天的充沛和雄强,生命元气是先天的豪放和莽直,所以,他的牛气是生于解放之前,与生俱来,草莽之时比在庙堂之上更冲更烈。不过有一点他是一贯之的,见贫民百姓从来不生牛,见军人从来不生牛。一人这样的群体,他便如鱼得水,惬意快乐。”

当我们坐在饭桌旁,忽然有人戏语地喊到“皇帝驾到”,原来是二月河来了。大家握手寒暄,我不知怎么称呼好,就近握手边小声地说“二老好”,他却幽默地回了一句:“只有一老,糟糠在老家打‘气’也来不及了。”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席间,三杯酒下肚,我胆子也大了起来,提出想请二月河讲讲他的军旅生涯。二月河抬起头,尽力睁大那双眯缝的眼睛,直视着我,说:“好,今天在座的

部队是所大学校,二月河的人生从这里开始,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在这里形成。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政治氛围相对比较宽松的军营,凭着顽强的意志和孜孜以求的精神,二月河不但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著作,还学习了英语,而且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毛主席著作。“当我穿上长头靴、趟进黑水巷道里去挖煤,感觉自己走到了人生的最底层。最底层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人生低谷,我无论从哪个方向努力,都是向上。我自学的意志就是从这个时候来的。”二月河说,“我白天打坑道,晚上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资料、读历史书籍,虽然苦一些累一些,但心情是十分愉快的,没有一点压抑感。”

听着二月河的讲述,作为一名现役军人,我尽力地去感悟他们这代军人的风骨和执著,努力把自己融入其中,静静地去品味那种融人、那种境界、那种豪情。

军旅生涯不但积蓄了二月河思想上、精神上的力量,更锻造了他强健的体魄和顽强的意志品格,为日后创作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写《康熙大帝》系列时,二月河已过而立之年。他白天上班,晚上收拾停当10点多开始写作,每次都写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20多年研读资料、进行创作,他没有两点前睡过觉。仲夏酷暑,夜间写作时,为了消暑和防止蚊虫叮咬,他就把两条腿放进桌下的水桶中。寒夜写作,到了凌晨两三点瞌睡难耐时,他就用烟头烫脸解困。写完《康熙大帝》第一卷时,他因劳累过度得了“鬼剃头”。他的幼女抚摸着他的头说:“这一块像尼泊尔,这一块像苏丹,这一块像墨西哥,这一块像琉球群岛。”500多万字的3部大书,二月河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为了追求最佳效果,他固执地坚持用笔而不用电脑写作。他风趣地说:“爱吃面的人都知道,手擀面比起机器压出来的面,味道好多了!”

“如果没有部队练就的好身板,培养和铸就的坚强意志,这个工程量肯定是做不下来的。”二月河说,“搞创作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有人形容像女人生孩子。搞创作也是一个很孤独的事情,是一个人在战斗。如何学会安慰自己、独立作战不辱使命,如何冒着敌人的炮火朝着胜利的

目标前进,这些都需要具备一名战士英勇无畏、勇往直前的品格。”

二月河在部队进步很快,入伍的第三年,就由战士直接提干,而且一提就是副连职,还当过连队的副指导员。说起部队的生活、环境,战友对他的帮助和影响,二月河总是怀着感激之情:“在那样的时期,部队的领导都很好地支持我,我在部队读书学习,阅读资料、考证史料等,没有受到任何的批判,也没有任何人为难我。反而是到了地方,‘文革’已经过去了,你要做什么事情还要特别小心翼翼。比如下班时人家拉你打扑克,我明知还要写作,打扑克的时间对我来说恰好是很难免的时间。‘我要回去写书不能和你们打扑克’,这话是绝对不敢讲的。这种环境和部队不能比。人是能够忘本笔记、明清人古述,就可以像读报纸那样得心应手,也可以写一些很完整的诗词和古文。”



1954年印度尼赫鲁总理携女儿访问北京,我有幸应邀在欢迎宴会上表演笛子。当优美的曲调、悠扬的笛声回荡在宴会大厅时,在周总理陪同下,尼赫鲁与女儿驻足在我们面前仔细聆听,我们的演奏受到客人的青睐。

1955年年底,我参加了由原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为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抵达印度新德里后,我们受到印度总统、总理的热情接见,并安排我们在观礼台上观看印度国庆节游行的热烈场面。然后我们到新德里郊区农村去看印度乡村民间节日歌舞的演出。在宽阔、平坦的广场上洒满金色的阳光,广场中央的舞台上,精彩的节目一个接一个,都是观众喜闻乐见的民间音乐、歌舞。观众坐在草地上,随着轻快音乐的节奏击着掌,摇晃着身子,上台台下相互呼应,热烈的情绪感染着每一个人。印度朋友告诉我们,印度

的广大群众痴迷自己的民间音乐和歌舞,孩子出生后,能走路就能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只要鼓乐一响起,大家就会情不自禁地舞动起来,印度人是非常乐观的。在新德里我们还参观了印度民间舞蹈传习班,舞蹈老师给学生仔细讲解头、腰、腿、脚、手、眼各部位形体动作的要领,他们言传身教,让学生反复练习。印度的民间乐器主要有笛、塔塔尔(弹拨乐)、坐地风琴(拉弦乐)、高低音瓦罐鼓等。演奏时在主旋律框架下,各种乐器即兴发挥,你奏主旋律,我铺垫,此起彼伏,相互配合非常默契,生动活泼别具特色,与我国民间乐器演奏有许多相同之处。

与印度朋友座谈时,我们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民间音乐歌舞继承发展的情况,之后表演了节目。我用竹笛吹奏了古曲《小凉州》,委婉、深邃的乐曲,赢得了在场热烈的掌声。舞蹈家于颖手握

挥之不去的记忆

王铁锤

着我又用竹笛吹奏了表现我国农村喜庆、热闹结婚场面的《婚礼曲》,赢得了满堂彩。于颖穿着新疆维吾尔族的衣服为大家表演了《打鼓舞》,舞姿优美,热情奔放,让观众赞叹不已。最后由我和印度音乐家合作演奏印度民间乐曲《帕蒂利》,乐曲欢快跳跃、幽默诙谐,精彩的演奏使观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位印度青年激动地挥舞着胳膊高喊:

挥之不去的记忆

王铁锤

着我又用竹笛吹奏了表现我国农村喜庆、热闹结婚场面的《婚礼曲》,赢得了满堂彩。于颖穿着新疆维吾尔族的衣服为大家表演了《打鼓舞》,舞姿优美,热情奔放,让观众赞叹不已。最后由我和印度音乐家合作演奏印度民间乐曲《帕蒂利》,乐曲欢快跳跃、幽默诙谐,精彩的演奏使观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位印度青年激动地挥舞着胳膊高喊:

挥之不去的记忆

王铁锤

着我又用竹笛吹奏了表现我国农村喜庆、热闹结婚场面的《婚礼曲》,赢得了满堂彩。于颖穿着新疆维吾尔族的衣服为大家表演了《打鼓舞》,舞姿优美,热情奔放,让观众赞叹不已。最后由我和印度音乐家合作演奏印度民间乐曲《帕蒂利》,乐曲欢快跳跃、幽默诙谐,精彩的演奏使观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位印度青年激动地挥舞着胳膊高喊:

挥之不去的记忆

王铁锤

着我又用竹笛吹奏了表现我国农村喜庆、热闹结婚场面的《婚礼曲》,赢得了满堂彩。于颖穿着新疆维吾尔族的衣服为大家表演了《打鼓舞》,舞姿优美,热情奔放,让观众赞叹不已。最后由我和印度音乐家合作演奏印度民间乐曲《帕蒂利》,乐曲欢快跳跃、幽默诙谐,精彩的演奏使观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位印度青年激动地挥舞着胳膊高喊:

挥之不去的记忆

王铁锤

着我又用竹笛吹奏了表现我国农村喜庆、热闹结婚场面的《婚礼曲》,赢得了满堂彩。于颖穿着新疆维吾尔族的衣服为大家表演了《打鼓舞》,舞姿优美,热情奔放,让观众赞叹不已。最后由我和印度音乐家合作演奏印度民间乐曲《帕蒂利》,乐曲欢快跳跃、幽默诙谐,精彩的演奏使观众席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一位印度青年激动地挥舞着胳膊高喊: